

抗战胜利后饮食消费的政治规制与精英悖论

——以示范效应为主要视角

周石峰¹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消费政治化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现象之一。抗战胜利之后, 奢风大盛, 国民政府再次推行节约运动, 自上而下对饮食消费进行政治规制, 对筵宴规格进行刚性管控。政治规制的严苛与精英阶层的炫耀性消费构成强烈冲突, 消费实践中投机主义盛行, 法规效力消解殆尽, 节约运动乏善可陈。由消费示范效应的角度审视, 运用政治甚至法律手段规制消费行为, 显非最佳治理策略。精英阶层既是消费规训者, 又是消费示范者, 此一精英悖论是民国时期节约运动效力不彰的关键因子。

【关键词】: 饮食消费 政治规制 抗战之后 精英悖论 示范效应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4-0072-07

消费政治化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现象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试图对消费行为进行政治规制, 起于 1930 年的节约运动, 或起或伏, 时显时隐, 绵延不绝。政治权力深度介入国民消费这一道德领域, 诚可视为“教养身体的政治”, 并能透视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困境。¹不过, 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改塑消费行为的治理策略, 始终难以破解消费示范效应的精英悖论。

本文主要基于消费示范效应的视角, 并且为了讨论相对集中, 而将论域重点聚焦于抗战胜利之后的筵宴节约问题, 以期管窥政治规制的精英指向及其悖论。

一、政治规制与精英指向

(一) 筵宴奢侈与政治规制。

全面抗战时期曾有“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的讽刺性现象, 而抗战胜利之后, 战时一度受到抑制的消费欲望得到有效释放并强烈反弹,² 社会上层的奢侈之风, 较前更加严重, “道德之沦丧与人心之萎靡, 为前史所未见”。^[1] 上海享乐主义盛行, 流行“苦尽甘来”的错误观念, 以致首次来华的外国人不认为中国是一贫穷国家。^[2] 东归上海者竞相“陶醉于物质享受”, 追求“新装、汽车、洋房”。^[3] 1946 年上半年, 筵席税一度跃居上海财政收入之首, 被讥为“建筑在筵席上”。^[4] 筵席捐在杭州市府收入中也占较大比重。^[5] 据广州“节约委员会”1945 年底的调查, 茶楼酒楼每日消耗“诚足惊人”, 但“紧急救济会”平均每日掩埋贫民尸体超过 20 具, 死因多系“颠连困苦, 营养不足”。^[6] 湖南灾情异常“惨重”, 甚至“演出了吃人肉的一幕”, 而长沙的“大人先生依然酒食征逐”, 省府改组之际, “冠台云集, 往来酬酢, 一席动辄数万金, 或一二十万金”, 形成“民间吃人肉, 官场人吃肉”的荒诞怪象。^{[7][8]} 因此, 即便《新运导报》亦承认: 大量民众“在饥饿线、死亡线上挣扎”。^[8] 蒋介石强调“风

¹ 作者简介: 周石峰,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精英阶层消费示范问题研究”(2016XZS020)

俗颓衰，于今为极”，^[9]而社会舆论则嘲讽道：“等到原子弹一丢，矮子们缩成了矮矮子，庆祝‘胜利’，吃‘禁’大开。恢复旧习惯，莫提‘新生活’”，节约运动“换了几位委员大人”，再度应时而起，而筵席又“首当其冲”。^{[10]277}

此次节约运动大致从1946年开始。4月中旬，蒋介石要求还都要员“切实提倡节约，为僚属示范”^[11]。在5月5日的首都各界庆祝还都大会上，蒋再次强调“戒浪费”、“尚节约”^[12]。根据蒋的训示，行政院相继颁行一系列节约法规，试图管控朝野双方的消费行为。节约法规的筵席条文主要涉及菜肴数量、价格和品类三个方面。

1946年的《复员期间节约筵席消费办法》规定中餐“每席十人以上不得逾六菜一汤，十人以下六人以上者不得逾四菜一汤，五人以下不得逾三菜一汤；西餐每客不得超过一汤两菜一点心。”^[13]1947年的《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规定中餐不能超过“六菜一汤”，西餐不能超过“两菜一汤”，中餐至少以八人为一席，不足一席之聚餐，则以一人一菜为标准，并由当地政府根据属地物价而限制每席或每客的最高价格，餐馆内不准销售政府禁止输入的饮食品，要求饮食业同业公会制定公约，以及主管机关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以收舆论制裁之效”。^[14]1948年的《饮食消费节约办法》更为细致和严格，除因国家庆典及慰劳将士、公务机关招待外宾，及举行重要会议之宴会和庆吊节约办法中允许而开办的宴会外，其他一律禁止，“俾收官导民遵之效”，^[15]同时规定“设立经济食堂，不准新设餐馆”，政府禁止输入之饮食品一律禁止销售。^[16]

1947年上海颁行的地方法规，要求中西酒菜业同业公会将节约筵席价格表呈报社会局核准，同时自定同业公约，包括执行筵席标准、禁售进口饮食品、各会员单位一律添设小吃部等。^[17]酒菜业公会自定中菜筵席最高限价未120万元、最低60万元，西菜筵席分别限价每人12万元和10万元，经济客饭一菜一汤，分为每客2万元、15000元和12000元三个等级。所列价格均为最高限价，各菜馆只能视其营业状况而逐渐降低。^[18]禁止输入饮食品的范围，可从1946年的《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一窥端倪，其附表“禁止进口货品”列有“鲍鱼、海参、燕窝、鱼翅”等奢侈品。^[19]1948年所拟《取缔进口奢侈品销售办法》，鱼翅和洋酒仍为主要管制对象。^[20]天津勤俭建国运动指导委员会也要求中餐不销售鱼翅、海参等“名贵菜”，西餐不销售洋酒和咖啡等消耗品。^[21]新疆对“不可避免之筵席、宴会”，要求以该省出产之蔬菜和肉类为限，若系维族筵席羊肉抓饭，则“不备他菜”。^[22]

（二）政治规制的精英指向。

央地两级的节约法规，均强调各地行政首长之宴会尤应以身作则，为民表率，俾收官导民遵之效，并且对公务员的筵宴以及必要的接待宴会，均予以细致规约，凡此种种，清晰透露出主政者对精英阶层示范效应的体悟与考量。消费节约运动应该指向精英阶层，这也是社会各界的最大共识。经济学家赵迺迺认为，除了军阀、豪门和奸商之外，多数民众的生活程度“不如战前远甚”，如果政府明了消费之“真铨”，并能为多数民众福利着想，则应该提高而非节约消费。他抨击京、沪奢风“为全国冠”，一席之费动辄数百万，并非百姓所能希冀，惟有“豪门奸商挥金如土，毫不介意”。他讽刺道：“试执一草履之夫而告以勿穿尼龙袜，或对一啃窝窝头者而嘱以勿多食黄油奶粉，他们真是受宠若惊，瞠目不知所答。”^{[23]220-221}崔敬伯强调，兵戈扰攘、民生凋敝，平民业已“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勤俭建国应该指向“社会上层尤其是少数都市里的上层人物”，呼吁“政治上层的人物做样子”。^[24]

社会舆论亦大声疾呼消费节约“从上做起”。上海《立报》强调，厉行节约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唯一出路”，但中下级公务员、商人以及一般平民，“终年辛苦，不获温饱，罗掘俱穷，节无可节”，而豪门巨富、达官贵人则“一席百万，了无难色”，“上层人物本身堕落，原不足惜，惟影响所至，为害至烈”，因此呼吁上层社会“公忠体国”，“尤望政府当局采行强迫上级节约的有效政策”，一改积弊已久的政治作风，“以挽回人心，补救危局”。^[1]《中国评论》强调，权贵阶层的奢侈行为“足以影响多数人的信仰”，如果上层人物“口是心非”，老百姓则“阳奉阴违”，呼吁当局从整顿上层着手，务使显宦豪门“先自检束”，养成勤俭风气，则风气所趋，必将事半功倍。^[25]《时事新报晚刊》指出，政府技术人员、大学教授或一部分自由职业者构成的中间阶层，“旦夕勤劳、夙夜匪懈”，但月入所得不足以维持“合理生活”，“已经衣无可节，食无可约，更无待国家三令五申的强迫施行”。节约运动固然需要政府与人民合作，但“最要紧的，还是在上者以身作则的来身体力行，

方能收到上行下效的效果”。^[26]

从空间而言，“节约应从上海做起”。上海开埠以后造成“骄奢淫逸的风气”，不仅“崇尚奢侈，而且道德堕落，沦为万恶的渊藪”，“表面繁荣远甚于战前，人力物力的浪费，可谓达于顶点”，“自应首先切实实行节约办法”，上海市政当局以及社会领袖应该“身体力行，实行节约，为民表率”。^[2]与此相似，《新闻报》也认为，上海的“酒食争逐、婚丧铺张、甜歌恒舞、交际馈赠”，“一切的昏天黑地与一切海派作风”，如果不能进行彻底改造，则不但全国节约“无从谈起”，而且“戡乱与建国”亦无从着手。“前方的士兵，到上海来一看，他们决不愿再上前线去了，全国的有志青年，到上海来一看，他们不再愿回到研究室与图书馆去了，全国刻苦的工农，到上海来一看，他们必然望洋兴叹，不愿再回到田野或机器房中去努力了。”^[27]

二、刚性规制与消费投机

“六菜一汤”的制度设计，暗含着政治理性对可计算性的崇拜，但其语义指向并不清晰，中餐、西餐的差异性规定亦遭诟病。时人揶揄性地指出，其“含糊笼统”之处有二，一是“汤”并无清晰规定，因为所指至少有三，“酸梅汤”为冷饮，“清汤”、“原汤”以及成都“高汤”是无菜汤汁，而“鲍鱼汤”、“腰片汤”、“母鸡汤”、“金银蛋花汤”和“西红柿牛肉汤”则为一菜。“六菜一汤”所涉“一汤”显非冷饮，但如系清汤，则与一人一菜的规定相较，七人反而比八人可多食一菜。二是中、西餐的数量规定并不对等，吃西餐者“太占便宜”。如果八人采用西餐中吃的方式，则八人可共享二十四菜。^{[28]56-57} 制度设计的形式理性与国人消费的实质理性之间明显存在矛盾，时人若庵指责消费节约办法“不切实际”，“八人一席”终非“十全十美”，如果多出一至二人，则只能“挨饿或看吃”，客人既感“招待欠周”，主人更要“负疚良深”。“六菜一汤”也不够“明朗化”，对于冷盆、热炒和大菜的安排，未曾学过代数、几何的厨子，恐怕求解不出正确答案。^{[10]278}

筵席节约恐非一种“将经营活动政治化、道德化的治理方式”，³而是基于道德问题政治化的治理逻辑。官员生活的奢侈与其职业清廉密切相关，但民众消费的奢侈则仅关乎道德，治理方式理应有别。在赵迺抃看来，勤俭建国运动包括政治运动与道德运动，前者指向整饬吏治，须有“强制性”，后者关乎公民教育，“可示范而不可苛扰”，“不宜有强制性”。^{[23]296} 但既以政治力量规制消费行为，根据科层制的逻辑，则必须进行数目字化的刚性规约，否则执行者缺乏操作的圭臬准绳。消费行为本质上是“炫耀自己所能承担的最昂贵的信号”，而可靠的信号传达要求存在某种程度的炫耀“浪费”、“精度”、“声望”或“稀缺”，其中炫耀浪费是“最简单、最流行的信号形式”。^[29] 因此，消费投机主义成为因应节约运动的基本策略。

抗战期间的消费节约运动，虽然政府三令五申，但结果欠佳。以著名报人徐铸成的经历为证。1942 年底，前线战事紧张，而重庆市面却日益繁盛，饭庄、酒肆、咖啡厅、俱乐部等消费场所“车马盈门”。官方推行“六盘一汤”并严禁饮酒。徐铸成以《大公报》香港记者身份赴渝，一新闻官款待徐，声称“限于禁令，只能一切从简”。徐看到每人面前放着两碟，一盛酱油，一个空着。第一道菜的盘子之大，内容之丰富多样，为徐生平所未见。主人吩咐“来点白醋”，跑堂上一大壶。主人即从徐起，一一将空碟斟满，然后举“碟”说“请”，“原来是香冽的老窖大曲”。冷盘之后的几个菜全是大盘，都有不同的四菜。最后一汤令徐“咋舌”，系鸡、鸭、蹄膀合成的“一品锅”，而徐早已“酒醉菜饱”。旁桌的“节约”筵席亦“大同小异”。期间曾有宪兵队巡查，但看到并无“违章”者，“也就心照不宣地走了”。^[30]

类似的投机主义行为，在抗战胜利后的节约运动中屡见不鲜。譬如上海，“点一席菜，连装着一碗一碗的搬出来，至再后一碗菜搬出来的时候，其中总有二三碗菜已吃光了的，那么把空碗收排再行递新菜，这样的循环换菜，只有主客知道吃几只菜了”，^[31] 要么声称还有客人要就餐，“自然名正言顺地可以多要一样菜”，^[32] “各大菜馆酒肆，吃节约菜者绝迹”。^[33] 杭州情况如出一辙。市长周象贤接受《申报》特派员采访，认为上一年经济状况颇佳，各地游客愿意花钱，“并不在乎什么”。杭州酒肆饭店可以满足顾客菜肴“丰盛”的需求，比上海“自由得多”。周坦言，游客消费若受限制，“必定扫兴”，而且“节约餐”规定太严，饮食店亦无法维持。他直言不讳：节约初衷不容否定，但其执行则“在于良心”，否则“吃完一道菜，把盆子拿走，再上一道菜”，“只落得徒劳无功”。^[5]

筵席节约有悖于社会性消费的炫耀性特征，因而攀比效应层出不穷。“婚丧喜庆原取个热闹，炫耀筵席，现命名为节约，便不炫耀，六菜一汤，也欠热闹。高贵的转移阵地到教堂，到鸡尾酒会。”上海社会“东西越贵越吃香，省钱的事没人干”，“节约果然肃清了外表的太多奢风气”。^[34]婚丧庆吊“竞尚奢靡”，否则“面子上有点不光彩”，^[35]“不够场面”，^[36]甚至认为“节约便是吝啬，是矫情”。^[37]圣诞夜的上海仍然供应每人50万元的“大菜”，而某局成立十周年纪念，仍然举办鸡尾酒会才“宾主尽欢”。^{[10]277}1948年的副总统竞选，孙科和李宗仁大宴群宾，“一时名贤毕至，冠盖如云”。^[38]社会舆论则质疑政府机关频繁的盛大宴会是否必要，认为只要通过各大餐馆的定座客牌和停车场所的汽车号码，即能查知筵宴主人。^{[7]232}

价格的传统角色被视为依赖于成本的“抑制剂”，^[39]但“声望”或“地位”商品的研究表明，价格往往是质量的“代理标记”，消费者愿意为功能相等的物品支付更高价格。^[40]近人赵超构曾将此现象称为“奢侈律”。他在解释重庆各餐馆“百元一菜”现象时，阐明了社会上、下阶层消费决策的差异，后者秉持“经济律”，“看货色，比价钱，处处打算”，“以最少支出获最大效用”。前者奉行“奢侈律”，“所考虑者是舒适生活之外，还要加上‘面子’，‘面子’之外，还要加上‘自负’心理的满足”。因此“才有声色犬马娱乐之好，才有珍稀宝物古董之癖，才有买物惟恐不贵，浪费惟恐不多之习。”“凡足以增长奢侈，助成浪费，表示其有钱的身份者，他们无不乐为。自己奢侈得不够，便委托他太太儿女做浪费代理人，太太还浪费不了，便委托他的仆人、他的狗、他的猫来浪费，你别以为他傻，他的浪费并非是无结果的，因为浪费换来了世俗的‘荣誉’。”对于“百元一菜”，着眼于分析“维他命含量”者是“呆子”，其真正原因仅在于“百元”高价能够满足富豪的“浪费瘾”。⁴

根据当地物价而限制饮食价格，操作难度极大。饮食品类极其多样，价格机制非常复杂，“姑不论过去的限价是否有成绩，公文旅行是否费时间，单以小菜而论，就是平时，在餐馆中价目即常有变更，很难规定”。春末夏初的茄子、青椒等价目，几乎每天行情都不相同。成都茄子初上市时，小如婴儿拳头者，“高悬水果店中，索价2千元一枚”，但随着供给增加，尽管“百物高涨数倍”，而茄子却仅卖数百元一斤。因此，假如每样菜品都限价，则必须分季成立各种委员会，如春天的“豌豆评价委员会”，夏天的“猪肉评价委员会”、“死活鱼评价委员会”，而秋天的“螃蟹委员”和冬天的“羊肾委员”亦必应时而生。“宫保鸡丁”加花生米与不加花生米，“蒸肉饼子汤”加味精与不加味精，其价格均可成为节约委员会的争执焦点，而当地政府的备查表报无非浪费纸张而已。^{[28]57-58}在恶性通胀的背景下，限价则更加困难，即使南京的顾客唯求“大快朵颐，虽然价昂，亦闷声大嚼”。^[41]

三、私厨家宴、消费品类与精英炫耀

（一）精英阶层的私厨家宴。

“专业化仆役”是有闲阶级的“明显有闲”的代理人，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和博取荣誉的工具，其仆人应该“训练有素”，“资质和技能”是“构成高薪仆役的功用的主要因素，是有教养的主妇的动人点缀之一”。^[42]

据作家树菜回忆，在民国“社会顶级阶层”中，虽有饭店请客者，但多系三五知友聚会，正式宴会主要在私宅举行。家宴需要宽敞的餐厅和讲究的餐具，而最重要者须有高端厨师，能让来客品尝到酒楼饭店中吃不到的精美菜肴。他指出，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第一银行创办人李敏、上海商业银行创办人陈光甫、中国垦业银行行长王伯元、大陆银行行长谈公远等金融巨子的家厨手艺，在上海政、商两界颇负盛名。曾任华东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树菜父亲，每次赴宴归来，都盛赞菜品精细而味美。树菜家的两名厨师来自常熟两家酒楼，但其父认为远逊于李、谈的家厨，因为后者系苏州世家子弟沈京似亲自培养。^[43]树菜所述，清晰透露出金融精英之间对饮食服务的模仿与攀比，“邻居效应”⁵彰显无遗。时人海戈认为，筵席节约条文仅针对承办筵席之餐馆业，而对“达官贵人之家庭宴客，则无明文，似嫌不甚公允”。因为中国讲究饮食者，“以用自己的厨子做菜请客为最高贵”，雅名“郇厨”。他指出，前行政院长便是极考究此道者，家中雇有广东、江浙、平津以及四川等省和外国名厨，其家庭宴客菜单，每视客人省籍而定。酒宴之丰富，菜肴之精美，南京市面，无出其右。^{[28]58}

社会中、下层将外出就餐视为改善生活品质，而社会顶层则恰恰相反，供养甚至调教私厨是生活品味的象征，举办家宴成

为上流社会的惯习。筵席节约“只禁菜馆，家用则不在禁止之例”，^[44]导致“若干私设厨房遂应运而生，仍出售各种贵重菜肴，且价格大增”。^[45]1948年5月，上海地方当局认为此举有违中央节约之本旨初衷，函请警察局“协助取缔”。^[46]然而公馆宴客，即使抽查也“无从查起”。^[47]

(二) 消费品类与精英标识。

节约法令所禁奢侈品类较多，为了讨论相对集中，此处仅聚焦于鱼翅。鱼翅系鲨鱼之鳍，包括脊鳍、胸鳍、腹鳍、尾鳍，其中尾鳍壮大，最为贵重，被行家誉为“黄鱼尾”，外国人视为“弃置不用的废物”，而我国则视为“席上之珍”。^[48]明代以降，鱼翅“始为珍品，宴客无之，则客以为慢”，其烹饪工艺复杂，耗时较长，尚需大量辅材，即使“庖人为此，未必尽得法”。^[49]据袁枚所记，我国古之八珍“并无海鲜之说”，但“世俗尚之”，“不得不从众”而作海鲜食单，“鱼翅难烂，须煮两日才能摧刚为柔”，或用“好火腿、好鸡汤，加鲜笋、冰糖钱许煨烂”，或“纯用鸡汤串细萝卜丝，拆碎鳞翅，搀和其中，瓢浮碗面，令食者不能辨其为萝卜丝、为鱼翅”。^[50]

民国以降，大量言论以科学主义为武器，试图消解国人的鱼翅崇拜。近人徐莫成曾经对银行员工进行生活教育，强调饮食之道在于“适中”，“不能纵欲”，“不可任性”，满足营养需求即可。他特别强调，富贵之人嗜食鱼翅、海参等珍贵之品，往往易生胆石症，“医治极感棘手”。^[51]国民政府禁用鱼翅，部分舆论亦“极赞成”，认为鱼翅“食之无味，如同嚼蜡”，^[52]“实一无可取”，必须借助“熏制猪火腿之味”，否则难以下咽。况且菜馆鱼翅价格太高，如果禁食鱼翅，则筵席价格必定大幅度降低。^[53]但是，消费既有获得物质满足的“第一级效用”，亦有争名显富的“第二级效用”。^[54]谢觉哉深刻洞察到饮食的潮流效应：“吾人于味之美否，大抵阿世所尚，或欣其昂贵，以心理作用冲动生理作用，美之者未必真美，且或较不美于所不美者，而以世俗美之之故，不得不从而美之。”^[55]

有学者宣称：“告诉我你吃的什么菜，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⁶这意味着饮食暗含着消费者的身份密码。鱼翅、燕窝汤和皮蛋曾被西方人视为中国饮食的符号，^[56]而前两者也是高阶地位的饮食表达。“节俭当崇”是“荣氏家训”之一，1934年，荣德生夫妇六旬寿辰“力持节俭，不欲过事铺张”，但在他人看来，则“酒菜甚丰满”，每席16元。前几道菜系鱼翅、燕窝等。^[57]1923年，杨希闵宴请孙中山，席有价值百元之鱼翅，孙声称：“我为粤人，鱼翅亦为粤之名饌，但吃此尚属第一次”，并问“叨陪末座”的吴铁城是否品尝过如此“价昂之佳肴”。^[58]于右任品尝上海梁园的鱼翅、烤鸭和瓦块鱼，亦“捻髭大乐”。^[59]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如此，知识精英亦不例外。以鱼翅而获盛名的“谭家菜”，诸多学界名流均有提及。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曾致信胡适：“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时名，久欲约先生一试。”⁷而朱自清则盛赞“谭家菜味厚重”。^[60]刘半农与钱玄同等人于马叙伦庆祝50岁生日，其中广东鱼翅20元。虽然价昂，但刘并不认为鱼翅味美。钱则揶揄广东人“不知味，以铜味为味”。次日晚上，刘半农又在“谭家菜”宴请叶恭綽。^[61]鲁迅在《祝福》中写道：“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墩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62]清墩鱼翅为绍兴名菜之一，地方性知识嵌入文学叙事，是文学创作的常用策略。“物美”诚与饮食习俗有关，而“价廉”则视收入而定。

上海筵席节约初始，仍有餐馆违规出售鱼翅、海参而受惩处，^[63]但后来检查则未发现销售禁售品的餐馆。^[64]不过，“扣黄肉鱼翅”以“黑市菜”的名义出现于酒宴，且菜价奇高。^[65]有“女梅兰芳”之称的焦鸿英，曾在私宅举办诞辰宴席，上海诸多政要出席，菜单中竟有“蟹粉鱼翅”。^[66]蒋介石夫妇于1948年5月视察无锡，地方当局的招待物品，计有“鱼翅酒席12桌，三五牌香烟60听”。^[67]虽然实行经济管制，但鱼翅需求不减，价格必定上涨。上海鱼翅一菜原售6万元，节约后竟达12万元。^[47]汉口的乌勾翅在1947年9月每担涨到400万元，10月中旬售价已达3200万元，12月中旬再次加价800万元。⁸同年12月中旬，上海鱼翅销路“奇畅”，市场做多，“市盘飞扬”，每担狂涨至1亿元左右。^[68]其中原因，除了普遍性的通胀因素之外，一是家庭私厨的需求旺盛，鱼翅“出路尚多”，^[69]二是各地商人“见海味禁用，将来来源颇有问题，乃大事囤积”，^[70]而菜馆

“名义上不出售，暗底下贮藏，然后高价出售”。^[69]

要言之，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执着于对消费行为进行政治规制，亦努力倡导精英阶层以上示下，但其效果显然乏善可陈。消费分层本质上是阶级关系的反映，^[71]在社会分化和流动的背景下，精英悖论难以破解。各界精英一身二任，既是消费主义的先行者和代言人，又兼任批判者和改造者，既践行炫耀性消费，又倡导黜奢崇俭，既膜拜进口商品，又鼓吹购买国货。“实施以来，成效显著”，^[72]这仅能视为政界的自我确认。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节约运动等相继而起，虽然“适合国情、切中时弊”，理论上“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但是，如果切实执行，则“奢靡之风，不至于如此之甚”，如果“行之有效”，则无需勤俭建国运动了。^[27]节约运动不过是精英阶层的拟剧表演，节约法令则成为民众眼中的“节约专书”或“节约档案”。^{[7]231}道德规训与法政规制各有其专属领地，“法律只能也只适合改变法律之所确立，风尚也只能改革风尚之所确立，如果以法律改变风尚，是一种很糟糕的策略”。^[73]

参考文献:

- [1]节约必须自上做起[N]. 立报, 1947-08-19(2).
- [2]节约运动应先上海做起[N]. 申报, 1947-09-26(2).
- [3]推行节约的意义[J]. 新运导报, 1947(1).
- [4]柯九思. 上海建筑在筵席上[J]. 上海警察, 1946(3).
- [5]储裕生. 西子湖畔周象贤市长一席谈[N]. 申报, 1948-02-23(5).
- [6]梁风. 广州片段[N]. 申报, 1946-01-06(1).
- [7]桐乡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委员会. 严独鹤杂感录[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 [8]我们为什么要节约[J]. 新运导报, 1946(2).
- [9]新运十三周年主席告全国同胞书[J]. 蒙藏月报, 1947(3).
- [10]本社, 编. 百味人生[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277.
- [11]对每一还都要员蒋主席晓以三事[N]. 申报, 1946-04-17(1).
- [12]主席告全国同胞[N]. 申报, 1946-05-06(1).
- [13]复员期间节约筵席消费办法[J].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 1946.
- [14]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J]. 湖北省政府公报, 1947(751).
- [15]饮食节约官导民随[N]. 大众夜报, 1948-12-31(2).

-
- [16] 饮食消费节约办法[J]. 金融周报, 1948(26).
- [17] 节约筵席价钱定出来了[N]. 和平日报, 1947-10-19(4).
- [18] 节约筵席价目议定[N]. 申报, 1947-10-19(4).
- [19] 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J]. 财政评论, 1946(5).
- [20] 本年八月一日开始禁售奢侈品[N]. 申报, 1948-05-22(1).
- [21] 本市成立勤俭节约运动指委会[J]. 天津市, 1948(11).
-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编. 民国时期新疆省组织人事制度档案史料选编[Z].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182.
- [23] 赵凯华, 等, 编. 赵迺抃文集(纪念先父诞辰 110 周年)[M]. 自印本, 2007.
- [24] 崔敬伯. 崔敬伯财政文丛: 下[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 [25] 止一. 勤俭运动须从上层做起[J]. 中国评论. 1948(10).
- [26] 节约要上而下的做起[N]. 时事新报晚刊, 1947-08-20(1).
- [27] 节约从上海做起[N]. 新闻报, 1947-08-17(2).
- [28] 海戈. 蒙尘集[M]. 上海: 时代书局, 1948.
- [29] (美) 杰弗里·米勒. 超市里的原始人: 什么是人类最根本的消费动机[M]. 苏健,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119-127.
- [30] 徐铸成. 杜月笙正传[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124-125.
- [31] 请帖乱飞[N]. 中华时报, 1947-11-12(4).
- [32] 打破节约筵席妙法[N]. 铁报, 1947-11-28(3).
- [33] 所谓节约筵席[N]. 力报, 1948-03-07(2).
- [34] 鲍畎埠, 编. 十里洋场众生相[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84.
- [35] 奢风不可长[N]. 一四七画报, 1946(11).
- [36] 提倡社会节约[N]. 益世报(上海), 1947-06-27(4).

-
- [37]我们要为建国而节约[J]. 新运导报, 1946(2).
- [38]冰心. 选举于节约[N]. 力报, 1948-04-08(2).
- [39]Engel, J. F., Kollat, D. T. and Blackwell, R. D., Consumer Behaviour[M].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68:429.
- [40]Creedy. John and Slottje. D. J.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Australia[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91:307.
- [41]夫子庙之菜馆[N]. 飞报, 1948-10-31(2).
- [42](美)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 蔡受百,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45、48.
- [43]树菜. 最后的玛祖卡[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228-230.
- [44]鱼翅海参家中尽吃不禁止[N]. 和平日报, 1947-10-18(7).
- [45]筵席节约菜馆叫苦[N]. 申报, 1947-10-02(4).
- [46]鱼翅海参公馆仍多[N]. 前线日报, 1948-05-06(3).
- [47]六菜一汤[N]. 铁报, 1947-10-17(2).
- [48]梁实秋. 人间有味是清欢[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13.
- [49]汪康年. 穰卿随笔[M]. 匡淑红, 编选, 校点.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311.
- [50]袁枚. 随园食单[M]. 别曩, 注译.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5:49、52.
- [51]刘平, 编纂. 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下):浙江兴业银行《兴业邮乘》期刊分类辑录 1932-1949[Z].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2518.
- [52]沙(鲨)鱼翅[N]. 小日报, 1947-09-21(3).
- [53]谈鱼翅[N]. 戏报, 1947-09-10(2).
- [54]王建国. 争名的经济学——位置消费理论[C]//汤敏, 茅于軾, 主编. 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三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89.
- [55]谢觉哉. 谢觉哉日记: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6.
- [56](美)克劳. 四万万顾客[M]. 夏伯铭, 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58.
- [57]荣德生. 荣德生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562、518-519.

[58]吴铁城. 忆述总理言行二三事[M]//尚明轩,等,编. 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1.

[59]陈存仁. 银元时代生活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94.

[60]朱自清. 朱自清全集:第9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287.

[61]朱洪. 刘半农传[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56.

[62]鲁迅. 故乡[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156.

[63]筵席节约组务会议[N]. 申报,1947-11-27(4).

[64]彭希祖. 半年来之筵席节约[J]. 社会月刊,1948(2).

[65]朱门酒肉臭的上海[N]. 大公晚报,1948-06-16(2).

[66]节约鱼翅[N]. 铁报,1947-11-15(3).

[67]蒋主席伉俪游锡记详[N]. 大公报,1948-05-18(6).

[68]海味坚挺[N]. 申报,1947-12-14(7).

[69]鱼翅海参禁用,价格反呈飞涨[N]. 大众夜报,1947-10-29(4).

[70]筵席节约开始检查,鱼翅海参价格陡涨[N]. 铁报,1947-10-30(1).

[71]鲁品越.《资本论》的存在论思想及其对唯物主义的四大贡献[C]//唐昆雄,欧阳恩良,主编.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总第2期.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15.

[72]王懋功,主编. 江苏省政府政情述要[Z].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265.

[73](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M]. 许明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63.

注释:

1 分见(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三联书店2017年版;孙钦梅:《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李大钊较早提倡将“时时创造新生活”作为人类的“最高欲求”(详细梳理可见陈勇军:《李大钊的社会主义理想观述论》,载唐昆雄、欧阳恩良主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总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123页),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如何“挪用”这一概念,值得深入爬梳。

2 郑会欣暗示了战时高级公务员生活艰难与战后奢风及贪腐之间存在相关性,见氏著《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3 此种观点参见邓丽兰：《饮食政治：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酒菜业治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4 引文见赵超构：《奢侈律》（1942 年 2 月 9 日），载《赵超构文集》第 2 卷，文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9 页。虽然赵超构并未直接使用凡勃伦效应，但其分析则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观点如出一辙，1936 年中华书局曾出版胡伊默翻译的《有闲阶级论》。而 1932 年第 47 期《中华周报（上海）》的“新词诠”对“有闲阶级”的解释，亦采用凡勃伦的界定。由此大概可以窥知两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以及西方知识在近代中国流转传播的一个侧面。

5 为避免自尊受损而“同左邻右舍比排场比阔气”，此即“邻居效应”，或称“人际效应”。参见 McCormick, Duesenberry and Veblen: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pp. 1125-1129。

6 此处引文参见（法）图珊·萨玛：《布尔乔亚饮食史》，管筱明译，花城出版社 2007 年版，封底。萨玛认为布尔乔亚阶级建构了一种新的饮食方式，通过展示食物而证实其社会地位。

7 谭家菜采用“去商业化”的经营策略，“实同于外间酒楼，但主人自高身份，只承认客人是借他宅宴客。席间设主人一座，宴会开始前，谭瑶青与客略事寒暄，即退席。谭家菜以鱼翅最有名，须事先订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每馐 4 元，其价甚昂”，相关介绍及陈垣与胡适的书信均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外一种）》，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2 页。

8 分别参见《经济通讯（汉口）》（1947 年第 436、437、507 期）的“本日市场动态”。